

《西曲歌》所见南朝长江中游之城市经济发展

王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西曲歌》产生于南朝时期的荆、郢、樊、邓之间,虽为乐府民歌,但它鲜少反映民间疾苦,盖因其诞生地并非穷乡僻壤,而是城市。它以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为描写对象,城市经济的发达、商业贸易的繁荣、市民的游乐、贾客商旅的离情别绪、城市的声色之娱等等在《西曲歌》中皆有反映。

关键词: 南朝 《西曲歌》; 乐府民歌; 长江中游; 城市; 商品贸易

中图分类号: F299.29.3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3)-06-0173-04

—

南朝时期长江中游主要包含荆、雍、郢三州,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其水路有长江沟通东西,又有汉水联结南北,加之湘、资、沅、醴四水以及夏水、阳水、丹水、均水、沮水、漳水等河流与长江、汉水交汇,船行极为便利^[1];其陆路则有荆襄驿道,起止于关中与江陵,自西周以来即为中原与南方交通的最便利快捷的路线。交通运输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始终与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紧密相联,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空间扩展的主要力量之一。长江中游地区水路与陆路纵横交错,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这个交通运输网络极大地提高了这一区域的通达性^①,使其与东西、南北之间以及本地区各郡县之间的联系皆十分通畅。汉末以来,这种地理位置成为长江中游地区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提升的重要基础。首先,长江中游地区战略性城池纷纷出现,并在随后发展成为新的城市。其次,甲兵尽聚,流民散处,加大了当地经济开发的广度与力度,农业得到较快发展。最后,基于军事目的发展起了造船业与冶铸业,并由此带来了手工业的兴盛。在此基础之上,各朝统治者以及地方官吏复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发展经济,使得长江中游(荆州)与长江下游(扬州)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宋书》卷五十四言:

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

其时“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2]1738},二州的州治江陵与建康成为长江流域最为繁华的城市,“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2]1540}。齐、梁之时,荆、扬地区经济仍继续发展,梁时荆州江陵还一度成为首都所在地。

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加上相对安定的生活,遂在长江中游诞生出了南朝民歌——《西曲歌》。《乐府诗集》收录有《西曲歌》34首,或为舞曲,或为倚歌,主要产生于南朝时期的荆、郢、樊、邓之间。如《西鸟夜飞》、《江陵乐》出于江陵,《襄阳乐》、《襄阳蹋铜蹄》出于襄阳,《石城乐》、《莫愁乐》出于竟陵,《三洲歌》出于巴陵,《寿阳乐》出于寿阳,《寻阳乐》出于寻阳等等,大抵以长江中游与汉水沿岸的城市为主要描写对象。城市经济的发达、商业贸易的繁荣、市民的游乐、贾客商旅的离情别绪、城市的声色之娱是《西曲歌》歌咏的主要内容。

南朝长江中游的商品贸易以襄阳、江陵为中心,

收稿日期: 2013-04-06

基金项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长江中游地区的商品流通与市场研究”(3154110401)。

作者简介: 王玲(1977—)女,湖北省襄阳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

E-mail: xfwangling@126.com

① 通达性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中广泛使用的概念,它指的是某特定位置的交通运输条件,包括移动的距离、时间及所涉及的费用等。参见魏后凯撰《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

并初步形成了以襄阳、江陵为中心,遍及长江中游各郡县的城市贸易网络。从《西曲歌》中可以略窥其貌。

襄阳扼汉水而立,上通雍、梁,下通江、扬,又有唐白河可通司、豫,由于地处南北水陆交通要冲,故为物荟萃之所,物资聚散的一个重镇,商品贸易因而盛起来。汉末刘表治襄阳时,“百工集趣,机巧万端”,手工业者云集,“交扬益州,尽遣驿使”^[3],其商品贸易已延伸至东西南北各个地区。南朝时襄阳为雍州刺史治所,商品贸易较之前朝更为兴盛,南朝齐武帝布衣时曾游历过襄阳,称帝后追忆襄阳乐事,作有《估客乐》,梁改其名为《商旅行》,从曲名即可知是缘于商业兴盛而作。也正由于商业的繁荣,襄阳成为《西曲歌》的策源地之一。

《襄阳乐》歌云^{[4]703}:

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儿女,花艳惊郎目。

上水郎担篙,下水摇双橹。四角龙子幡,环环江当柱。

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但问相随否,何计道里长。

人言襄阳乐,乐作非依处。乘星冒风流,还依扬州去。

郭茂倩题解引《古今乐录》曰:“《襄阳乐》者,宋随王诞之所作也。诞始为襄阳郡,元嘉二十六年仍为雍州刺史,夜闻诸女歌谣,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阳来夜乐’之语也。”歌中“郎”的身份显然是商人,他们从襄阳出发,途中有大堤、江陵、扬州三个重要贸易点。大堤位于宜城境内,据《水经注·沔水》载,沔水自襄阳南过宜城县东,宜城乃“故郢郢之旧都,秦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其地人杰地灵,史载“襄阳郡岷首山,南至宜城百余里,其间雕墙峻宇,閭阎填列。汉宣帝末年,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5]。其地经济开发较早,楚国时已修建了灌溉工程长渠与木渠,后汉王宠任南郡太守时,又“凿蛮水与木里沟,溉田六千余顷”^{[6]484}。当地人口殷盛,交通便利,宜城大堤便成为商业繁盛之所,这在梁简文帝萧纲的笔下就有描写。普通四年(523年)至中大通二年(530年)萧纲为雍州刺史,镇襄阳,期间作《雍州曲》3首,其《大堤》云“宜城断中道,行旅极留连。出妻工织素,妖姬惯数钱。”自汉末战乱以来,北方流民大量南下,宜城因地处汉水沿岸,成为流民迁居的一个据点,宋时因流民较多之故,侨立华山郡蓝田县于宜城大堤,

安置以康氏家族为首的三千余家胡人。胡人善于经商,他们迁居到宜城,利用宜城“断中道”的地理位置进行广泛的商业活动。胡族妇女,即人们称为“胡姬”者当街买卖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尤以“沽酒”最为有名,常常进入文人的诗歌当中,如“胡姬沽酒谁论价”之句。简文帝笔下惯于数钱的“妖姬”大概很多亦来自于此。襄阳与江陵陆路步道五百里,水路“千数百里”颇为不便,西晋杜预乃开杨口,将杨水、夏水、汉水相连,东晋时刺史王敦在江陵“凿漕河通江汉南北埭”^{[6]398},这两项水利工程使得襄阳与江陵之间的水路大为便利,而且从襄阳往返都城所在地扬州贸易必经江陵,故襄阳与江陵之间的经济联系甚为密切,《襄阳乐》中所反映的就是水上贸易之状况。

南朝江陵是荆州刺史治所,梁时一度为都城所在地,是堪与建康相比的繁荣都市,史称“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2]1540}。江陵的沿江贸易在三国时就颇具规模,如吴主孙休在位时,“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7]。扬州是江陵贸易的重点地区,众多的商贾沿长江上下,在江陵与扬州之间“年年逐利西复东”。《西曲歌》中有很多对此种商贸活动的反映。

《那呵滩》歌曰^{[4]714}:

沿江引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担篙,何时至江陵。

江陵三千三,何足持作远。书疏数知闻,莫令信使断。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弯。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郭茂倩题引《古今乐录》曰:“《那呵滩》……多叙江陵及扬州事,那呵,盖滩名也。”《宋书·州郡志》曰荆州治所江陵“去京都水三千三百八十里”,《懊侬歌》曰“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4]667},则所谓“江陵三千三”正是指江陵与扬州之间的水路行程,扬州在长江下游,故云“下扬州”,从扬州到江陵乃“上水”,须用纤绳拉船逆水而上,故曰“沿江引百丈”,速度自然很慢,故有“何时至江陵”之叹。江津,“故城在今荆州江陵县东”^[8],东汉时设有江津长,主渡江南诸州贡奉。由于江水至江津后变大,非方舟不可涉渡,沿江上下皆需在江津换船,故使江津成为人口往来与商贸往来的一个固定渡口。南齐荆州刺史萧巽离江陵返都,“发江津,士女观送数千人”^{[9]408},刘孝绰有

《江津寄刘之遴诗》,阴铿亦作有《江津送刘光禄不及》,其诗云“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10],此是普通民众利用江津渡口往来之状况。江津还是一个很大的航运码头,停泊着许多船只,《西曲哥·石城乐》歌曰:“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4]698}。可见,平常在江津聚集的商船有上百艘。很显然,这种大型码头的存在必然使得江津成为一个人口流动的中转站,四方物资的集散地。《那呵滩》所云之“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弯”,讲的就是商人从江陵出发到扬州与情人在江津告别的情景。商船大小不一,“大艚载三千,渐水丈五余”^{[4]698}。船上所载货物大多是米、帛、布、绢之类,亦有部分奢侈品。

江陵往扬州必经巴陵,因而巴陵亦为一个重要商埠,《三洲歌》产生于此。《古今乐录》言“《三洲歌》者,商客数游巴陵三江口往还,因共作此歌”,其词有“送欢板桥弯,相待三山头。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4]707}。为商旅生活的真实写照无疑。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11]，“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4]702}。终日辛苦劳作而仍不免于饥寒的现实促使大量的农民弃农从商。然而,经商的高回报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高风险及与亲人的聚少离多,从荆州入蜀或者下扬州的经商之路路途遥远、危险重重,“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4]702}。因而,频繁的水上贸易既带来了荆州商业的繁华,亦为无数的贾客、船户之家带来了无尽的离情与相思。《西曲歌》表现此类缠绵别情之曲尤多,如《石城乐》:“闻欢远行去,相送方山亭。风吹黄蘗藩,恶闻苦离声。”《莫愁乐》:“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此类民歌皆叙伤别望归之思。

二

经济的繁盛、生活的安定带来了歌舞游乐的发达。无论在乡间还是在城市,“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2]2261}城市之中更是一派歌舞和乐之象,“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袿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9]913}人们享受着生活,歌颂着生活,曾经的侨居之愁、战乱之忧、分离之苦已在眼前的歌舞升平中渐渐淡却。城市民众的这种游乐生活在《西曲歌》中有许多反映。

《江陵乐》就反映了春天时节荆州中心城市江陵人民的“蹋百草”活动,其歌曰^{[4]710}:

不复蹋踉人,踉地地欲穿。盆隘欢绳断,蹋坏绛罗裙。

不复出场戏,踉场生青草。试作两三回,踉场方就好。

阳春二三月,相将蹋百草。逢人驻步看,扬声皆言好。

“蹋百草”乃荆襄地区一种禳灾习俗,传说踩踏百草露水,可以祛毒去热。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花团锦簇,春光明媚,人们“相将踏百草”,欢快的舞蹈引得路人驻足而观,大声叫好。又如《石城乐》^{[4]689}:

生长石城下,开窗对城楼。城中诸少年,出入见依投。

阳春百花生,摘插环髻前。挽指蹋忘愁,相与及盛年。

《唐书·乐志》云“石城乐者,宋臧质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质尝为竟陵郡,于城上眺属,见群少年歌谣通畅,因作此曲。”可知《石城乐》是在民歌的基础之上创作而成。上引二曲与《江陵乐》类似,词中女主人公活动的背景亦是春天百花盛开时节,人们出门游乐、踏青、歌唱。《襄阳乐》、《雍州曲》对于市民的游乐生活亦有反映,如梁简文帝制《北渚》^{[4]705}:

岸阴垂柳叶,平江含粉蝶。好值城傍人,多逢荡舟妾。绿水溅长袖,浮苔染轻楫。

类似还有《南湖》^{[4]705}:

南湖荇叶浮,复有佳期游。银纶翡翠钁,玉舳芙蓉舟。荷香乱衣麝,桡声送急流。

汉末以来,传统的礼制规范在战乱中分崩离析,曾经被礼教牢牢束缚在闺阁中的女子开始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进行了丰富多彩的社交活动,呼朋引伴,游山玩水,饮酒谈诗,而且男女之间的交际也多有放达、不拘行迹之处。出现在简文帝笔下的“荡舟妾”应该不只是那些专事情色交易的女子,也包括跨出闺门的普通女性。

“货财盛则声色臻”,为适应城市里有钱阶级及商贾的需要,荆州城市的声色之娱随之而生。对伎乐生活的描写在《西曲歌》中随处可见,如简文帝《乌栖曲》^{[4]695}:

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帷翠被任君低。

织成屏风金屈膝,朱唇玉面灯前出。

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自前。

梁元帝亦作有《乌栖曲》^{[4]695}:

浓黛轻红点花色,还欲令人不相识。

金壶夜水诤能多,莫持奢用比悬河。

梁元帝萧绎普通七年(526年)至大同六年(540年)为荆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年)复为荆州刺史。“南朝乃一声色社会”^{[12]200},贵族、官僚出入娼家亦属常见,上述三曲即是源于此种生活而作。另如前文所引《襄阳乐》:“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儿女,花艳惊郎目。”若言行乐处,当需大堤行,大堤花月夜名盛天下,“大堤女儿郎莫寻,三三五五结同心。清晨对镜冶容色,意欲取郎千万金”^{[4]704}。一直到唐代,大堤仍是男子寻欢作乐的重要去处,有歌云“南国多佳人,莫若大堤女。玉床翠羽帐,宝袜莲花炬”、“二八婊娟大堤女,开垆相对依江渚。待客登楼向水看,邀郎卷幔临花语。……岁岁逢迎沙岸间,北人多识绿云鬟”^{[4]705}等等。

《西曲歌》在描写声色犬马生活时更多地是从上层士人的视角出发,故而多是热闹、繁华与欢愉,也有少量作品表现出对这些不幸女子的悲悯情怀。如《寻阳乐》^{[4]718}、《夜渡娘》^{[4]716}:

鸡亭故依去,九里新依还。送一却迎
两,无有暂时闲。

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微叙
情,奈依身苦何!

这清楚记载着娼女对卖笑生涯的辛酸控诉。

《西曲歌》虽为民歌,但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悲苦在这里甚少见到,34首《西曲歌》中真正反映普通百姓劳动生活的唯《采桑度》七首,如“春月采桑时,林下与欢俱。养蚕不满百,那得罗绣襦。”“伪蚕化作茧,烂漫不成丝。徒劳地所获,养蚕持底为?”^{[4]709}城市生活成为《西曲歌》描述的主题,这是因为《西曲歌》的发源地并非穷乡僻壤之区,而是城市,萧涤非云“南朝民间乐府……而乃以城市都邑为其策源地者。如《吴歌》盛行之建业,《西曲》发源之荆、襄、樊、邓,前者既系当日首都,后者亦为重镇。今观其词;……若《西曲》,则其中有《襄阳乐》焉,有《石城乐》焉,有《寻阳乐》焉,有《江陵乐》焉,皆以城名为曲调之标志,其为出于城市,实至显而易见。”^{[12]198}

另外,《西曲歌》歌词大多是热情洋溢的情歌,这也跟城市的繁华分不开。“居住在这些物质条件好、交通畅达的城市里的市民们,生活一般比较充裕,礼教对他们约束力小,他们的思想比较自由大胆,这是产生热烈情歌的主要条件”^[13]。宋、梁之时“以荆、雍为南方重镇,皆王子为之牧。江左辞咏,莫不称之,以为乐土”^{[4]724},号为“乐土”的江陵、襄阳、石城等城市正符合了这种情歌产生的条件。城市本易流于声色,故其“歌词多淫哇不典正”^{[2]552},对于声色情爱不仅表现得非常大胆而且十分露骨,有时不免流于低俗。

参考文献:

- [1] 杨守敬. 水经注疏[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 [2]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1262.
- [4]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5] 乐史. 太平寰宇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816.
- [6] 王象之. 舆地纪胜[M]. 台北: 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1971.
- [7]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158.
- [8]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28.
- [9]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10]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 卷十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274.
- [12] 萧涤非.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13] 王运熙. 乐府诗述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27.

(责任编辑 程 苹)